

张大可 俞樟华 著

中国文献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献学



张大可 俞樟华 著

中国文献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献学/张大可, 俞樟华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9
ISBN 7-211-05049-7

I. 中... II. ①张... ②俞... III. 文献学—中国
IV. 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3782 号

中国文献学

ZHONGGUO WENXIANXUE

张大可 俞樟华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彩虹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东水路 55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730 毫米×990 毫米 1/16 20.25 印张 323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11-05049-7/定价: 2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中国文献学既年轻而又古老。说它年轻，是因为“文献学”这一概念是20世纪产生的新名词。“文献学”的建构是20世纪80年代后正式兴起的学问，它的理论建构还在探索之中，并未形成定式。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国文献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它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产物。中国文献学的产生，从孔子整理六经算起已有二千四五百年的历史，传统文献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但是古代没有“文献学”的概念，而只有“文献”的定义，于是有学者认为：古代只有文献工作，没有文献学。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有文献工作，就有文献学。所谓“学”，就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是实践工作的理论积淀。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凭空产生。某一门学问的实践工作，既是基础，也是这一门学问的构成部分。也就是说，文献工作本身就是文献学的构成部分。

于是又有了另一个极端，把整理文献的基础工作所产生的目录、版本、校勘等分支学科叠加起来叫做“文献学”，这也是不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目的和方法。目录、版本、校勘，既然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有各自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目的和方法，那么叠加起来的“文献学”，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目的和方法在哪里？被叠加的几大块与叠加起来的总体，岂不是完全重合吗？显然叠加起来的“文献学”是一个空头的学科，因此是不能成立的。换句话说，“文献学”不是目录、版本、校勘的叠加，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文献学”既然是20世纪新生的名词，它应当是20世纪新生的学科，所以是年轻的。由于“文献学”是以古今的一切文献，以及古今一切文献分支学科为研究对象，它不能脱离目录、版本、校勘等而独立存在，所以又是古老的。

如何解读这种关系呢？还得从头说起。

中国传统文献学，或称古典文献学，省称古文献学，它由许多分支文献学组成，一是由校讎工作而发展演化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辨伪学、辑佚学；再是由经学讲习传授而演化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注疏学等等。文献的数量与日俱增，文献工作不断发展，因此，古文献学的各分支文献学是逐渐积累发展起来的。20世纪文献大发展，文献工作随之发展，因而产生了新的文献学分支学科，大体说有三个系统：一是伴随新型出版社和图书馆的产生而产生了编辑学、图书馆学、图书馆目录学、索引书目学、文献检索学、文献情报学等；二是伴随科技与文化的发展而产生了文献新载体，从而产生了载体学、电子文献学、古籍整理学、今注今译学；三是伴随新材料的发现而产生了文献学的相关学科——甲骨学、简牍学、古文书学、档案学等等。20世纪新增的这些文献学分支学科，可总称为现代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总称就是“中国文献学”。但这只是广义上的“中国文献学”，仅仅是一个称谓，不具有理论建构，不是一门学科。

学术的发展不断地深入，因而学科门类也不断地细化，同时也要求有不断的综合。文献工作的深入发展，产生了众多的分支文献学，而如何总结这些分支文献学的经验，把握各分支文献学的发展规律，上升为指导性的理论学科，这就是综合型的通论文献学，即狭义文献学。狭义文献学以广义文献学的各分支文献学为考察对象、研究范围，进行综合的理论归纳，有对象、有范围、有目的，所以是一门新生的学科。在这里，广义文献学与狭义文献学二者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研究对象，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归纳。因此，狭义文献学考察叙述的内容，仍然是目录、版本、校勘等等，但它不是这些分支文献学的叠加，而是升华、总结这些分支文献学的经验，纳入一个宏观的体系之中，成为文献学的高超层次。各分支文献学是基础学科，也是实证学科，分支文献学理论是微观、狭小范围的总结，文献学是宏观的、综合的理论总结，是高级形式通论文献学理论。

在中国旧学者的思考中，把文献学泛称为校讎学和考据学，始终摆脱不了产生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当时的学术环境与基础。由于这一思维定式的惯性波及，使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的几十部“文献学”论著，十之八九仍徘徊在古典文献学的藩篱之中。他们考察文献的范围到五四为止，以古籍为界域，看不到新生文献的发展，漠视新文献工作的主流形

态，至今还没有一部现代文献学产生，这个偏差应予纠正。

文献学是总结文献工作之学。文献在发展，文献工作在发展，文献学也理应向前发展。让我们看一看 20 世纪文献工作的特点。

20 世纪是人类社会步入电子时代快速发展的新世纪，科技文化的高涨，使全社会人民大众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五四运动，结束了文言文写作的传统积习。社会进步、教育发达、白语文写作，这一切带来了作者队伍的空前壮大，各种写作人群以百万计。另一方面是社会需求，精神食粮已成为社会大众每日必需的消费品，再加上现代印刷具有无限的生产能力，20 世纪文献的生产以几何级数成百倍地增长。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每年出版的图书发行量就达五六亿册，还有报刊、杂志、媒体文献，数不胜数。事物的发展，总是量变引发质变。20 世纪的文献工作，就是由于当代文献数量的急剧增加，改变了文献工作的主流形态，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具体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文献工作是学术型的整理旧籍，宗旨是修复、还原所整理的文献原貌；20 世纪产生了服务型的文献工作，即图书馆业务，宗旨是大规模收藏图书，向社会开放，于是产生了图书馆目录与图书馆检索的文献工作，并产生了新的文献分支学科，即图书馆学与文献检索学。正是由于图书馆目录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革新了目录学。

第二，传统文献工作，以专业文献学者为主体进行综合整理，版本、校勘、考据、辨伪、结集、收藏等一系列文献工作，毕其功于一役。古代国家大规模整理图书尤其如此，如西汉刘向校书、清代修纂《四库全书》。私人刻书与收藏整理也大体如此。20 世纪文献工作以个人为主体的综合性整理日益淡出，而社会分工与群体协作的专项文献工作成为主流形态。就是当代古籍整理，也由学术团体、学者、出版社与图书馆，诸多部门协作完成，并且成为经常性的程式。

第三，文献工作是还原旧籍，学术研究是解读历史文献内涵，两者有很大区别。20 世纪产生了文献工作与学术研究两者交融而不可分割的新学问，就是 20 世纪新材料带来的新学问，即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吐鲁番学以及考古学。这些领域的文献工作与学术研究是兼容的，也是 20 世纪前传统文献工作所没有的。

第四，20 世纪科技日新月异，于是产生了不断拓展载体转换的文献

自序

工作。从技术角度说,当代古籍整理就是印刷载体的转换,古籍整理的现代化就是电脑与网络为载体的转换,这已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20世纪文献工作的上述特点,已生动地表明,乾嘉时代的旧学高峰已成历史,新学的潮流浩浩荡荡,文献学建构怎能故步自封囿于五四以前的旧籍呢?

不可置疑,经历两千多年积淀的古典文献学各个分支学科所创立的理论和经验,是文献整理的基础工作,例如目录、版本、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等等,只要有文献整理,这些基础工作都是不能改易的。整理五四以前的旧籍,四部分类的目录也是最完善的。但是一部综合型的文献学理论,它应贯通古今,包括新学与旧学,以古今一切文献为对象,所以这是一门新学问,而不是旧学分支的叠加。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专门之学,其基础是微观研究,而综合型的文献学是宏观概括,它以总结各分支文献学微观研究的成就、经验、方法,升华为综合型的宏观理论,为考察文献工作的走向提供指导。

20世纪是旧学与新学的一个过渡时期。20世纪上半叶,旧学还占主导,新学诞生;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新学占了主导。构建综合型的文献学理论,也是20世纪80年代才成型的。因此本书“中国文献学”,以总结“20世纪的文献学”为核心内容,即以新学为主要内容构架文献学体系,并包括旧学。因此,对文献学的定义,采取“以一切历史文献为对象”的新理论,用以反映包括20世纪整个时段的文献内容与文献整理工作,而不囿于古文献的范围。具体说,“中国文献学”的内容和任务,就是要概括整个20世纪这一时间段的整体文献学,它以20世纪传世的古文献和新增的历史文献为对象,考察它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整理利用及其历史发展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进行现代综合型通论文献学理论建构的尝试。目前学术界出版的诸多文献学论著,基本上仍停留在传统古文献学几大块的研究范围内,所综合的理论仅仅是对传统文献学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如果目光只囿于传统的古文献学,那么文献学的旧框架就无法打破,它不仅远离实际,而且全新体系的文献学理论将永远无法建立,这是有悖于学科发展的。由于20世纪文献与文献整理工作的迅猛发展,反映这一时代的文献发展与文献整理工作,建立全新体系的文献学,义不容辞地落在我们的肩上。为此,本书作者不揣简陋,大胆地进行文献学理论的建构,以期抛砖引玉,收效于将来。

最后，我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气魄，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还要感谢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是他信任地交给我这一任务。时间是2002年秋，希望我在2003年完成。我邀请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俞樟华与我长期合作。樟华同志搜集了百余万字的资料，提供二十多本参考书，使我们掌握了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前沿研究的资料。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编部陈远唤主任提供了第十章电子文献一节的写作。在整个工作进程中，傅璇琮先生始终予以坚定的信任与支持，不断督促，才得以完成。如果没有福建人民出版社和傅璇琮先生的坚定支持和信任，这部书稿是不会产生的。为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对文献学研究不够，水平有限，加之时间匆忙，自己不很满意，本书的理论建构也只是一种探索，说不上是“一家之言”。如前文所述，权作抛砖引玉吧。

张大可

2004年5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文献与历史文献新界说	(1)
第二节 传统的文献整理与古文献学	(6)
第三节 20 世纪的文献学	(12)
第二章 文献载体	(18)
第一节 印刷术通行前的古文献及其载体	(19)
第二节 雕版印刷文献	(32)
第三节 活字印刷——20 世纪的主流载体文献	(45)
第四节 现代技术载体文献	(52)
第三章 20 世纪新发现的古文献及古今档案与考古文献	(57)
第一节 甲骨文献	(57)
第二节 简牍文献	(65)
第三节 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献	(78)
第四节 档案文献	(85)
第五节 考古文献	(95)
第四章 典籍类别文献	(101)
第一节 四部典籍文献	(102)
第二节 类书、丛书	(113)
第三节 方志文献	(116)
第四节 佛藏、道藏	(119)
第五节 当代文献	(123)

目录

第六节 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	(136)
第五章 目录学 ·····	(143)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143)
第二节 中国古典书目分类法的演变·····	(145)
第三节 20 世纪目录工作的扩展·····	(149)
第四节 图书分类法的变革·····	(152)
第五节 目录学的功能·····	(159)
第六节 20 世纪的目录学家及其成就·····	(161)
第六章 版本学、校勘学 ·····	(168)
第一节 版本学·····	(168)
第二节 校勘学·····	(179)
第七章 考据学、辨伪学、辑佚学 ·····	(189)
第一节 考据学·····	(189)
第二节 辨伪学·····	(197)
第三节 辑佚学·····	(207)
第八章 古籍整理 ·····	(214)
第一节 古籍整理的方法·····	(214)
第二节 选本与结集·····	(221)
第三节 资料汇编·····	(224)
第四节 古籍整理的发展与成绩·····	(228)
第九章 古籍的注疏与今注今译 ·····	(235)
第一节 古代的注疏·····	(235)
第二节 古籍的今注·····	(239)
第三节 古籍的今译·····	(244)
第十章 文献的收藏与检索 ·····	(258)
第一节 现代的图书馆藏书·····	(259)
第二节 检索工具索引书目·····	(264)
第三节 文献的检索原理和方法·····	(266)
第四节 音像文献的检索·····	(273)
第五节 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	(274)
第十一章 中国文献学的理论建构 ·····	(282)

第一节	综合型通论文献学是文献学体系中的新兴学科·····	(282)
第二节	《中国文献学概要》建构文献学理论的尝试·····	(283)
第三节	张舜徽构建文献学理论的奠基性贡献·····	(286)
第四节	20 世纪 80 年代文献学论著的兴起 ·····	(289)
第五节	文献学理论研究·····	(293)
附录 ·····		(296)
附录一	有特色的古籍专业出版社·····	(296)
附录二	高等院校古典文献专业与研究机构·····	(301)
附录三	本书征引及参考主要书目·····	(307)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文献学内涵的架构模式做概略的探讨，为全书之纲。

第一节 文献与历史文献新界说

文献，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活动的全部历史和经验，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因此，“文献”一词的涵义在不断地变化与扩大。由于“文献”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是“文献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文献学”的内容也是伴随“文献”词义的扩大而发展。“文献”词义的变化是怎样随历史的变迁而发展，当今对“文献”的词义应赋予什么样的新的理念，这是首先要弄明白的。

一 文献的本义

“文献”二字连用，最早出自孔子的言论，记载于《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汉、宋大儒郑玄、朱熹等以典籍释“文”，以贤人释“献”。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更明确地解释说：“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近人刘师培在《文献解》中进一步申说云：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古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又说：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上述诸儒解释

第一章 绪 论

“文献”本义甚确。“文”，指典籍文章；“献”，指耆旧先贤所熟悉的各种礼仪，以及耆旧先贤的见闻、言议与事迹。由于在上古时代，文字记录以甲骨、金石、简牍等物质材料为载体，书写十分困难，因此历史及知识的传授，大量的通过口耳传闻，少量的才是文字记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就指出，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说明在左氏成书之前，《春秋》的传授是口耳相传的。公羊、穀梁两家，更晚于战国时成书，口耳相传的时间更长。孔子的《论语》也是由门人弟子“相与辑而论纂”成书的。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也是和当时的物质条件分不开的。口耳相传历史与有知识的耆旧贤士自然受到人们的尊敬，被称为“圣”“善”“哲”“贤”，他们是知识的载体，统称为“献”。

孔子慨叹夏、殷之礼久远，而夏、殷的后代杞、宋两国保存的文字典籍不多，口耳传授知识的贤士大夫寡少，无法考证。要是杞、宋两国“文”与“献”两方面的材料充足，夏、殷之礼就能够验证了。这表明孔子鲜明地认识到叙述历史、考核史事，需要充足的文献做根据。他晚年致力于六经的整理，就是要为历史保存文献。正是由于孔子整理六经的文献工作，萌芽和产生了文献学。

二 文献涵义的演变

宋末元初马端临以“文献”二字名其书，曰《文献通考》，并在该书《自叙》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释。马端临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氏的《文献通考》，不是通考“文献”的文献学，而是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他之所以认真地辨析“文”与“献”，旨在说明《文献通考》的取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图书资料，二是名流言议，并在行文中加以区别。凡是顶格写的，都是书本记载；凡是低一格写的，都是名流言议。正因为“文”与“献”两字有不同的含义，而又为孔子所连用，使得古代学者把传说口碑、名人言议与书

本记载并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过细细推敲，马氏笔下的“文献”二字，涵义已有了变化。孔子所说的“献”，指贤者身之所习与口传的知识，而马氏换题为“论事”，凡臣僚奏疏、诸儒评论、稗官记录都包括其中，这些已经是“文”的范围。马氏论事中的“名流之燕谈”还保留了“献”的本始意义。这一部分，直到今天还有它的遗迹，例如采访的调查报告，记录硕学以及各行艺术大师的口述资料，还有民间一些风俗礼仪的演习与整理，都需要请教那些熟悉方方面面掌故的人。

马端临对“文献”一词所下“叙事”与“论事”的定义，实际缩小了原始“文献”词义的范围，只认定“文字记载”才是“文献”，非文字记载的知识载体就不是“文献”。按这一定义，“文物”就不属于文献。因此，人们一提起“文献”，就总是与图书、典籍并列起来，有的统称之为“图书文献”“典籍文献”。当然“图书”“典籍”是文献，但不能等同于文献，即不能包含全部文献。

三 现代的文献概念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如果从商、周时代甲骨文及金文算起，中国历史文献已有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今天种类繁多的文献，与甲骨文、金文相较，真是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古代的“文献”概念，当然不能适用于今天。要建立科学的现代文献学，首先必须对“文献”一词做出新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含义，说法不一。《文献》杂志1985年第4期，开辟了讨论专栏，展开了讨论。该刊编辑部在《致读者》一文中指出，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解释，代表性的意见为两种：“一种是把‘文献’看做是一联合结构的名词性词组，文指文章，献指贤人，另一种认为文献是指图籍和文物。”该刊同期发表邵胜定《说文献》一文，对两种解说都不赞同，他认为文献即上献的书籍文章，不应包括文物。《文献》1986年第1期刊载傅振伦的《释文献》与单柳溪的《文献诠释》两文，又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傅文说：“文献学就是图书资料之学，包括口碑，往事的追记回忆，不见经传的古迹古物的再现、勘查，以及现在时事和人类、民俗调查等等资料在内。换言之，文献学也就是目录学。”单文则认为：

第一章 绪 论

“具有使用价值、历史价值的字、词、语、篇、书、人、时、事、地、物具体材料的科学、典型、完备知识的资料，就是文献。”学术界还有其他种种说法，兹不具引。

如何定义“文献”的词义，关键是它能否包容发展了的物质技术及其用途。今天讨论“文献”一词，不是考证词源的语义界定，而是作为文献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要反映现代化的“文献”实际，要有科学性，因此本书对“文献”的涵盖，定义如下：

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等，均为文献。

在这个定义中，一切图书、期刊、报纸、图画、谱表等，有历史价值的符号、文物，以及各种视听资料如胶片、胶卷、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片、影片、磁带、电脑、数字等等，它们都是人类知识的记录，只不过是形式与载体不同而已，都应当是文献。我们认为这是广义的、全面的“文献”含义。“文献”二字是一个统一概念，不能分割。

随着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深入，“文献”的旧概念已不完全适用。所以在实际运用中“文献”的概念在不断地演变和扩大。在当今的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已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载体。

当前学术界已出版的多种文献学著作，一般都还是在传统界定的含义中讨论“文献”，认为它是一个旧名词，只能使用它原本的意义。我们认为，即使“文献”原本意义，也要重新予以科学的说明。作为人类知识记录的文献，不论其形成途径、制作方式或出版与否，关键在于有一定的载体作为依托而成为确定的可感知的对象。古人界定“文”与“献”的区别，目的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献者，贤也，指的是演习礼仪及言议的载体。而作为演习礼仪和言议载体的硕学耆儒本身并不是图书，但他们的言谈议论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转化成图书。例如《论语》这部图书，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载，它既是“文”，亦是“献”。进一步说，图书本身也只不过是文字记录的知识载体。同理可证，出土的骨骼化石或没有文字的各类文化遗存，本身并不是文字资料，但他们蕴藏的历史价值可以通过古生物学家、文物考古学家的鉴定、诠释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说得确切一些，文物是考古学家的文献；文物考古所形成的文字资料是历史学家的文献。把文物排除在文献之外，是没有道理的。

在孔子对“文献”一词的运用中，以及后代硕学耆儒对“文献”一词的解说中，根本就没有“载体”的概念。“献”，实质是载体。文献学家并不直接研究载体，所以马端临用“论事”去代替“献”，从原始涵义上看似缩小了“文献”词义的范围，而实质上更接近于“文献”的词义。当然，马端临时代也不会产生“载体”的概念。“载体”是现代“文献”一词含义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可以说没有载体，就没有文献。我们说文物也是文献，就指的是文物也是一种知识载体，它最终将转化成文字资料。

全面的“文献”定义，文指知识记录的符号，包括文字、图画、图形、符号、音像等；献指知识记录依托的载体，包括图书、贤者、文物、胶片、胶卷、录音录像带、影片、磁带、电子资料等。换句话说，“文”和“献”都在发展。“文献”二字，分开来看，是一个联合词组，这是古义；合起来看，不应当分割，乃是今义。本书重新界定的“文献”含义，简言之，就是“人类知识的记录”，它总是通过一定的记录方式（即文），并附在一定的可以被感知的载体（即献）上。“文”与“献”迥异而又是不能分割的。对“文献”一词的含义做这样扩大和革新的界定，目的是扩大文献学的视野，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即突破“古籍文献”的藩篱，包容当代的图书文献与科技文明。可以预料，未来的科技发展，还会出现我们预想不到的知识记录形式和载体，但它都将统一在“人类知识的记录”这一界定的含义中。但迄今为止，有文字记录的图书仍是文献的主体，而且是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文献”一词的原有意义不能割断，尤其是在传统的古典文献学的用语中，更是只有原本的意义。换句话说，“文献”一词，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文献，就是由一定载体所表现的全部人类知识的记录；狭义文献，专指传统的古典文献，也就是原本的含义。

四 历史文献

何谓历史文献？亦有广、狭二义，可作如下界定：

广义历史文献，系指一切文献；狭义历史文献，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历史史料文献，其中历史记注与撰述的典籍是狭义历史文献的主体。